



余英时

人文·民主·思想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CIPIC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21

人文·民主·思想

余英时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民主·思想/余英时著. -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10-0421-5

I. ①人… II. ①余…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342 号

书 名: 人文·民主·思想
作 者: 余英时

责任编辑: 王 玮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1092 毫米)
印 张: 3.5
字 数: 45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421-5
定 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代序：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能够成为二〇〇六年“克鲁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知识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一九四〇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

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入籍的国家——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转轴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给有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

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中国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点与转轴时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个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现实世界只是这个永恒世界的拷贝，但早期中国哲学绝未提到这种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为二，但中国宗教传统也没有这种清楚的划分。早期佛教文化极端否定现实世界，将其视为虚无，中国的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道”的观念也是由转轴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转轴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

和“道”的观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明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

在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二十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西相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我对中国知识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盖古代乃至二十世纪，而我的第二个轴线始终把重点放在历史阶段的转变时期。和其他文明比较起来，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延续与变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携手并进。因此我为自己设定两个研究目标，其一是辨识中国历史上知

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其二是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变迁是否有其独一无二的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断代方式被马克思-斯大林主义者鼓吹的五阶段演化史取代，后者在今日的中国仍被奉为正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接下来容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两个不同

的价值系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在历史的脉络下相对照？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四〇年代晚期，当时中西相对的一系列问题笼罩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从此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不时出入于中、西两个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对我已经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初期的心理调适，我早已对美国生活方式乐在其中，但同时仍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相容，最好途径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

中国与近代西方初遇是在十六世纪末期，当时耶稣会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其中对文化敏感的利玛窦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宗教气氛是非常宽容的，儒、释、道基本上被视为一体的，就是在这种宗教的宽容精神下，利玛窦才得以使当时许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认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这样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国基督教徒宣扬一种基督教与儒家的合成体，等于让中国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进去。

十九世纪晚期，一些心胸同样开明的儒家热心接受在西方当道的价值和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权。当他们之中有人前往欧洲与美国，并停留足够时间去做第一手观察时，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

到了上世纪初，中国出现两个对立的儒学派，一是现代儒学（或称新儒学、当代新儒学），一是传统儒学，两个学派都鼓吹民主，并对早期儒家经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开有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然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价值系统的相容性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我对“人权”要说几句话。“人权”和“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词，原本不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论述。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一九四八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

语》、《孟子》和其他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元九年和三十五年的帝王谕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儒家从未接受奴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理论和做法。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西相对的一系列问题也将终结。

本文为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五日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获颁克鲁格奖（Kluge Prize）时所作的得奖演说，译文经作者删定。

目 录

代序：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1）

“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1）

人文与民主

——在“余纪忠讲座”上的演讲（37）

中国思想史研究综述

——中国思想史上四次突破（60）

“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

一、“国学”观念的复苏

自上世纪九〇年代所谓“国学热”以来，“国学”这个观念，在消歇了四十多年之后，几乎一夜之间又在中国大陆上复苏了。与其他的“热”——如“文化热”、“‘后学’热”相较，“国学热”具有两项明显的特色：第一、它的持续性，十几年来这股“热”不但未消退，而且还在继续增高；第二、它的扩张性，即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国学热”的社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突出现象，电视上有各种“论坛”，著名大学附设“国学”训练

班，培养“企业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资源”，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活动。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网路则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如果说“国学”今天是大陆上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大概不算是夸张。

“国学热”的社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但不在我要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今天讲演的主旨是检讨“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关系。“国学热”不但最初是从学术和文化界开始的，而且也在学术和文化界发生了实际的影响。最明显的，清末以来的所谓“国学大师”重新为新一代人文研究者所发现，他们的著作在淹没了三四十年之后也重新受到普遍的重视。

近几年来“国学大师”的传记和全集、选集等一直是大陆出版界一个十分兴旺的部门。在中国人文研究（如文、史、哲）的领域中，偃后重生的“国学”也不断扩张它的影响力；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开设了“国学研究”的专业中心，甚至还成立了“国学研究院”；以“国学”命名或以